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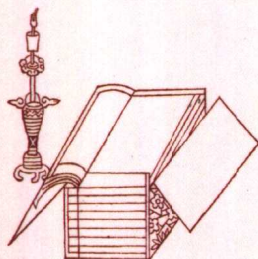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
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
僧千二百五十人
俱皆是大阿羅漢
眾所知識長老舍
利弗摩訶目犍連
摩訶迦葉摩訶迦
拏延摩訶俱絺羅
離婆多周利槃陀
伽難陀阿難陀羅
睺羅憍梵波提賓
頭盧頗羅墮迦留
陀夷摩訶劫賓那
薄拘羅阿菟樓駄
如是等諸大弟子
并諸菩薩摩訶薩
文殊師利法王子

中国禁书简史

ZHONGGUO JINSHU JIANSHI ZHONGGUO JINSHU JIANSHI

陈正宏 谈蓓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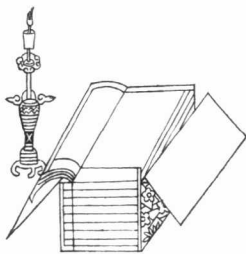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中国禁书简史

ZHONGGUO JINSHU JIANSHI ZHONGGUO JINSHU JIANSHI

陈正宏 谈蓓芳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书简史 / 陈正宏, 谈蓓芳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68-607-X

I. 中... II. ①陈... ②谈... III. 禁书—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037 号

中国禁书简史



作者——陈正宏 谈蓓芳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田振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刷——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

字数——20.2 万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 000 册

书号——ISBN 7-80668-607-X/I·177

定价——17.00 元

序

章培恒

得知陈正宏、谈蓓芳教授合著，并由张宏生教授撰写了其中一节的《中国禁书简史》经过增订，要出单行本了，我赶紧向陈、谈二位请求说：“我来写一篇序。”承蒙二位慨允，我遂欣然命笔。

记得——但也许是记错的——《镜花缘》中有一笑话：某先生去拜访朋友，到了那里，却见朋友跪在地上，向着一位端坐椅中的人磕头，那人左手拿着朋友的一把精美折扇，右手拿着一支笔，同时不断地摇头。某先生恍然大悟：坐着的一定是造诣很深的书法家，朋友在求他给自己的扇子写字，他却不肯轻易答应，于是向书法家说道：“你这么真诚地求你，你就给他写一写吧！”谁知朋友忙不迭地叫道：“别，别，别！我是在求他别写。”我的自请写序，与这位书法家的硬要给人的扇子写字，颇有异曲同工之概；不过他是要卖弄自己的书法，我则是想借此交代两件深感负疚的事。

这部《中国禁书简史》原是安平秋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禁书大观》中的一部分，该书的责任编辑是戴俊、陈征先生。当时我已在复旦大学中国古籍研究所担任所长，陈征先生则是复旦的校友，所以先由他来约稿。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但光是我们一个研究所的力量还不够，就约请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负责人安平秋教授一起主编，又约请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研究员共同主持，并通过安、吴二位邀约了他们单位的部分研究人员参加。由于参加者都学有专长，加上戴、陈二位卓有

成效的工作，书很顺利地编成了。全书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中国禁书简史》，第二部分是《中国禁书解题》，第三部分则是吴格先生负责的《中国历代禁书目录》。

陈、谈二位承担的《中国禁书简史》在当时可谓白手起家，因为在这以前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样的工作。用现在常见的话来说，他们二位是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个空白。为了减轻他们的工作量，我又约请了对南宋江湖派深有研究的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当时他还是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青年教师）撰写其中关于江湖派著作被禁的一节，也蒙他鼎力支持，这是我至今深为感谢的。

书编成后，校样很快地打出来了。但在付印前夕，陈征先生跑来跟我说，出版社领导为慎重起见，又请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审读了一遍。那位资深编辑在肯定这部稿子的基础上，对个别地方提出了一点意见。陈征先生特地关照：“这只是供你参考的，你认为不必改的就随它去好了。”我想，这大概也代表了戴俊先生的看法。

我把这位编辑先生的意见认真读了一遍，体会到他所重视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乃是《中国禁书简史》的最末一段：

自然，在清朝以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远没有使禁书和杀害作者的事件绝迹，只不过在于这些勾当时所打的却是“革命”的旗帜。例如，在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大规模地禁书，遭到禁止的当代文艺书籍达一百数十种。沈从文先生对此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国民党在文化界的喽啰就对沈从文大肆攻击，指责他“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见上海《社会新闻》第六卷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原来，他们禁书就是在“革命”；沈从文竟然对此不满，其“站在

“反革命的立场”自然再无疑义。但这一切已都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了。

我知道谈蓓芳写这一切都只是客观地叙述史实(明、清部分是她撰写的),并无他意;但我更知道这位资深编辑的好意及其对于世事的洞明,便擅自把从“只不过”到“再无疑义”的这些话都删掉了。只是把这页校样复印了一份,聊作纪念。在《中国禁书大观》出版以后,谈蓓芳曾经问我,最末一段还有些话怎么不见了;我向她作了简单的说明,她就没有再响。但如不是我神经过敏,那么,她对这事恐怕是不满意的。转念一想,我的删掉这一段,虽跟那位资深编辑一样是出于好意,但到底是别人的文章,怎能事先不征得同意就代为删去呢?——这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第一件负疚之事。

第二件事情就更为麻烦而复杂。

《中国禁书大观》一出版就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年光景就销了十万多册。大概在1992年,戴俊先生来跟我说,日本一家出版社要将它翻译出版,问我是否同意;我在征求安平秋先生意见后就签署了合同。但这时才知道合同是跟一个版权中介机构签的,我则连日方出版社的名称也不清楚。到了1994年,日译本出来了,我不禁目瞪口呆。书是日本的一家大出版社新潮社出的,并且列入了“新潮选书”,日译的书名为《中国の禁书》,著译者署“章培恒 安平秋主编”、“水上正 松尾康宪译”,这似乎都没有问题;译者的态度也是真诚而严肃的;要命的是,其《译者前言》说:“由于是面向日本的一般读者的译作,并未收入全文,只是把作为全书精髓的《禁书简史》译出,加以介绍。”而对于这部《中国禁书简史》的作者陈正宏、谈蓓芳教授和撰写其中关于江湖派书籍被禁事件的张宏生教授却只字未提。这样一来,日本的读者就必然误认为此一《中国禁书简史》是我和安平秋

先生所作，我与他就都在客观上剽窃了这一成果。

于是赶紧请戴俊先生要出版社跟那个中介机构交涉，回答是日方出版社说等再版时改正。此后就没了消息。前几年托一位日本朋友打听，说是此书在日本颇受好评，已出了第三版了，但在署名问题上仍跟初版一样。看来找那个中介机构——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中介机构是否还存在——是不管用的。虽有几位熟识的日本朋友，但又不好意思为这些琐事麻烦他们去跟新潮社交涉。这就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到了今年春天，承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副教授丸山浩明博士惠赠其大作《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书末有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专家、原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准确的名称是研究室主任，这里按照中国的习惯称呼）、二松学舍大学校长伊藤漱平教授的一篇长跋，在介绍丸山副教授在复旦大学研修的情况时，贱名也曾蒙齿及，却不料接着又提到了我“与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安平秋所长的共同著作《中国の禁书》的选译（《新潮选书》）”，作为对我的情况介绍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面向日本的一般读者”的此书日译本已经受到了日本学术界——包括伊藤漱平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专家——的注意，这更令我汗颜无地。

我不由发起愁来。老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欺世盗名下去，怎么得了？幸而不久就听到了《中国禁书简史》经过增订、要出版单行本的事，我灵机一动，赶快自告奋勇地请求写序，以便把此事加以澄清；待出版后，再将此书送给我所认识的日本朋友，也就算间接说明了真相，了却了一件事。至于对我们所不认识的日本读者，那就无法可想、也无从顾及了。

啰里啰嗦地说了这一大堆，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这也算是“序”吗？其实，不要说读者，我自己看看都不像。但我的目的是交代这两件事；目的既达，就算陈、谈两位极叫“别！别！别”，我也充耳不闻；序的像不像，还管它作甚！

绪 言^{*}

* 本绪言由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撰写。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国家,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其文化就迅速地发展,后来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史上的最伟大的学说(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是西方的文化遗产);比较起来,在那一段时期里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显得十分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与明、清两朝的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联系。那么,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统治集团的文化政策无疑是其中之一,而禁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文化政策的反映。因此,研究中国禁书的历史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很早就开始禁书。如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就是禁书史的开端,幸而那只推行于秦国,而且时间也不长。等到秦始皇统一全国,焚书坑儒,才制造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浩劫。值得高兴的是:这样残暴的统治到底是无法持久的,统一全国后仅仅十五年,秦王朝就灭亡了。紧接着的汉王朝,吸取了秦的教训,在西汉前期的几十年间,对人民的统治较前宽松,汉惠帝时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却并未禁止百家的著作。根据现有的资料,重新下令禁书,是在

西晋。但其所禁，乃是天文图讖，而且天文书也并不是根本禁绝，只是禁止民间收藏和学习。自东晋至整个南北朝期间，南方沿袭了西晋的禁令，没有再予扩大；北方则在有的地区和有些时期，将《老》《庄》、佛经、道书也分别列为禁书，但那都只是一时（甚或一时中的一地）的政策。所以，就总体上看，从西晋至南北朝，在文化方面的统治虽有所加强，然而却还不算严酷。隋、唐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格局。鲁迅先生说：“遥想汉人多少闲放，……唐人也还不算弱。”（《坟·看镜有感》）这与从汉至唐的文化政策也是有关系的吧！

从宋代起，禁书的范围扩大了。不但特别注意了禁兵书，而且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的《江湖集》，私人所著的记述宋代史事之书，乃至有的学术著作都曾在一段时期里遭到查禁。可见宋代的统治集团除了害怕人民造反外，还害怕和仇视本阶级的人批评朝政。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远比唐代严厉了。所以鲁迅先生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同上）当然，他所说的“现在”，是指他那个时代。

元代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朝代，其政治上的统治虽然残暴，但大概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思想禁锢却并不酷烈。除了禁止与人民的造反可能发生直接关系的“妖书”和前朝就已禁止的天文讖纬外，当时所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禁书事件是禁毁“伪道经”事件，那只是和尚道士在皇帝面前争宠、皇帝对道士的某些做法不满的结果，并非以加强思想统治为目的。

接下来的明王朝在这方面可就比较元朝高明得多了。朱元璋做皇帝后，老是怀疑士大夫与他离心离德，对他轻视和讥刺，所以莫名其妙地杀了一大批士大夫；稍有辫子可抓的，当然更加要杀，例如孙蕡就因给大臣蓝玉所藏的画题过诗，后来蓝玉被认为谋反，孙蕡也就作为“蓝党”杀掉了。这些人

被杀以后,虽然没有发布禁止其著作的正式命令,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他们的著作就无人再敢刊刻,介于禁与不禁之间,等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皇帝,一开始就杀了一大批反对党。他虽然也未宣布这些被杀者的书是禁书,但当他后来发现有人收藏被杀的方孝孺的著作时,把那人也给杀了。这样,这些人的著作实际上也就成了禁书。这以后的皇帝,虽然没有朱元璋和朱棣厉害,但对于禁书的工作也抓得很紧。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妖术”色彩的“妖书”以外,思想上不符合规范的书也遭到查禁。因此,《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文衡》之类的文章选本、《观宇篇》之类的著作,都曾成为禁书;至于李贽,更因其所著《焚书》、《藏书》、《卓吾大德》等“惑乱人心”而被逮捕,死在狱中,皇帝并命令将其著作全部焚毁,不准收藏。这些书不仅跟造反无涉,而且也不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只不过因其内容不符合“圣学”,才落得这样的结果。所以,与前代相比,宋代的禁书增加了压制对朝政的批评的性质,明代更进而以此来统一思想。禁书的范围固然日益扩大,对作者的迫害也日益残酷。自汉代以后,像李贽那样由于著作的“思想有问题”而遭惨祸的,这是最早的一个案例。

到了清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其前期不断发生文字狱,许多人都被无辜处死,有些甚至连家属也遭杀害。被害者的著作当然成了禁书。这些文字狱,主要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因其著作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纯粹是统治者为了示威而制造的案件——例如《字贯》案——也并非没有。与此相呼应,清代统治者又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对当时所流传的几乎全部图书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哪些书可以流通,哪些书在经过删改后方可流通,哪些书不能流通。这后一种也就是禁书,其数总共有几千种。这些禁书,很多都牵涉到民族问题,但也有不少仅是思想问题,如李

贲、袁宏道的著作等。可以说，清代是禁书的高峰时期。尽管从嘉庆时期起，像乾隆时的那种文字狱和禁书的事件看不到了，但那并不是统治者的政策有多少改变，而是士大夫已经相当驯服，如同龚自珍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那么严酷了。然而，到清代末期，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禁书这个手段又发挥了它的威力，邹容就因写《革命军》而进了监牢。这以后不久，清朝就灭亡了。

由上所述，可知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为我国历史上积极推行禁书政策、努力禁锢思想的时期。而这两朝，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的时期。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不把历史作为偶然事件的堆砌，那么，也就应该承认，明清两代正是我们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的一系列悲惨事件——的酝酿及其必然上演的时期。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我国禁书的简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尽管禁书事件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终结，但限于种种条件，我们的叙述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目 录

序(章培恒)	1
绪言	1
第一章 幼稚的严酷: 中国史上最早的两次禁书事件	1
第一节 两千年前的创举——从商鞅“燔《诗》 《书》”到韩非论禁书	1
第二节 旷世浩劫——秦始皇“焚书”事件	8
第三节 烬余沉思录	15
第二章 北方的飓风: 汉—唐五代禁书概览	18
第一节 刘邦·萧何·挟书律——汉初禁书及其 解禁	18
第二节 同一禁令, 两般后果——西晋首禁讖纬 天文	22
第三节 为有儒学待复兴——前秦再禁《老》《庄》 讖纬	29
第四节 异教典籍的劫难——北魏毁佛经与北周 并禁佛道	35
第五节 预言不再走运——南北朝至隋屡禁讖纬	45
第六节 盛世里的几朵乌云——从初唐焚《三皇 经》到盛唐禁阴阳术数书	49

第七节	承先启后——五代后周时期的一道禁书令	57
第八节	南北不同风	59
第三章	文治的阴影：宋代禁书面面观	64
第一节	天文与兵书——太祖至仁宗百年间禁书的两大主题	64
第二节	人间何处不巉岩——从乌台诗案到崇宁、宣和两毁苏、黄文集	72
第三节	千秋功罪，谁人方可评说——南宋屡禁野史	84
第四节	愈织愈密的网——绍兴毁《论语讲解》书版和淳熙严擅刻书籍之禁	94
第五节	宋代的最后一部禁书——《江湖集》	102
第六节	文治大曝光	108
第四章	意外的松弛：元代禁书寻踪	113
第一节	从宠儿到弃儿——宪宗世祖两毁“伪道经”	113
第二节	学步的背后——忽必烈屡禁天文图讖阴阳伪书	122
第三节	忘乎所以的僧侣与勃然大怒的帝王——铁木耳严惩伪造佛经者	127
第四节	可悲的怪圈	129
第五章	专制的强化：明代禁书透视	133
第一节	禁书史上的新发明——禁与不禁之间到不禁之禁	133
第二节	整肃思想的努力——禁止小说、清理时文和逮捕李贽	148
第三节	自作多情者的碰壁——向君主进献著作而遭禁毁	162

第四节	翻云覆雨,纷纭诡譎——由派系倾轧而导致的禁书	169
第五节	野火烧不尽——越禁越多的妖书	183
第六节	长夜自此始	190
第六章	惨酷的代价:清朝禁书总结	194
第一节	血腥的屠杀——康熙朝的文字狱及禁书	194
第二节	连疯子也不放过——文字狱在乾隆时的登峰造极	203
第三节	在征集图书的幌子下——《四库全书》编纂和书籍的空前浩劫	218
第四节	端人心而正风俗——为禁毁小说戏曲的不懈努力	231
第五节	抽刀断水水更流——清王朝查禁维新派著作及其他	248
第六节	无可奈何花落去——以《苏报》案为中心的禁书事件及其失败	258
第七节	欣慰的回顾	271
跋	274

幼稚的严酷： 中国史上最早的两次禁书事件

第一节 两千年前的创举——从商鞅 “燔《诗》《书》”到韩非论禁书

中国禁书的历史，是从西北一隅拉开它沉重的序幕的。

那是在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中原大地六强并峙。而位居九曲黄河那个硕大的“几”字字心下方，由一脉秦岭托负着的一个年轻国家——秦，也正雄心勃勃地酝酿着它角逐中原、虎视东方的庞大计划。公元前 362 年，二十一岁的嬴渠梁登上了秦国君主的宝座，是为秦孝公。当时秦的国力及文化水准都比不上中原的齐、楚、魏、燕、韩、赵诸国，而六国也因秦僻居西北，将它视作戎狄，不与它来往。这种屈辱的现实深深刺痛了年轻而有抱负的秦孝公的心，为此他发愤图强，首先向国内外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声称：“宾客群臣中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的，我将给他加官进爵，并分封田地给他！”这一招果然灵验，富有诱惑力的诏令传出不久，一位干练机警的谋士便从邻居魏国渡过黄河，应征而来。他便是后来为秦孝公策划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禁书事件的商鞅——当时还称公孙鞅。

公孙鞅原籍卫国，赴秦前曾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职。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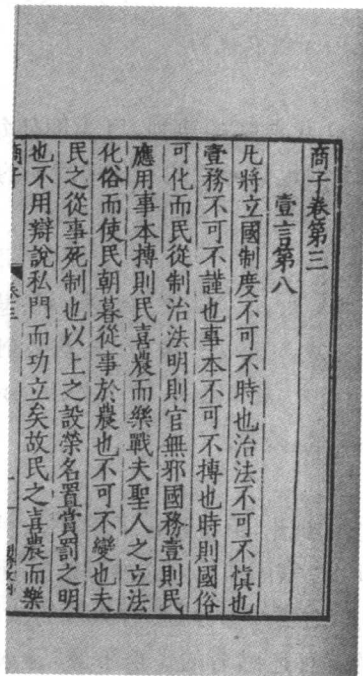
说公叔痤病逝前，曾向魏惠王推荐公孙鞅接替自己的丞相职位，在此提议未被恩准后，又建议魏惠王杀掉公孙鞅，以防这位年轻才子出国为他君效力。似乎是为了讨好一下自己的部下，公叔痤背着魏惠王，又一五一十地把荐职及谋害的事转告了公孙鞅，并劝他速速逃走。令丞相主子大感意外的是，年轻的部下断然拒绝他的一片诚意，冷冷地反诘道：“君王既然不用您的提议让我当丞相，又怎么会按您的意见来杀我呢？”果然不出公孙鞅所料，公叔痤死后，魏惠王连一根毫毛也没动他。但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对公孙鞅这位颇为自负的奇才也太没刺激了，所以一听说黄河那边的秦国正缺谋士，他便二话没说，走人。

一入秦地，首要的大事便是去拜见秦孝公。大约这次应诏的人不少，公孙鞅好歹托了个关系——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总算见到了秦孝公的尊容。但起初几次会面，效果并不理想，秦孝公不是听公孙鞅讲到一半便呼呼大睡，就是等公孙鞅走后便把景监唤来痛骂一顿，搞得景监出来便埋怨公孙鞅。但公孙鞅却不在乎这些，他太想在西北这个被鄙称为“戎狄”的地方一展他东方谋士的才华了，所以一方面死乞白赖地缠着景监，让他在秦孝公跟前多美言几句，一方面又不断地转换口径，从正统儒家的帝道、王道，转而为法家刑名之学，为各种诡异的霸术，终于说得秦孝公坐不安席，鬼迷心窍，把跟前这位邻居家跑来的能言善辩的家伙奉作了上宾。不过此时的公孙鞅心里明白，在爱好霸术的秦孝公手下干活，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秦国改造成一个德比殷周的东方标准文明国家了。

那么，不妨不管什么德与不德，认定目标干起来再说吧。公孙鞅于是在孝公跟前大肆鼓吹他的变法理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

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商子》
明刊本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公孙鞅虽然力主不效法古代，但他为了证明其观点，仍不得不举出商汤革命、武王伐纣与夏、商灭亡的历史事实来作佐证。与此同时，有关变法的具体措施，也已逐渐酝酿成熟。据学者考订，出自战国晚期秦人或秦国客卿之手的《商君书》（一名《商子》），乃是公孙鞅的后学采集其遗言遗教加以阐发而写成的变法论文集，其中的许多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公孙鞅之手，但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商君书》的《算地》、《去强》等篇中有实行重农重战的理论，《定法》、《赏刑》等文中有推行厚赏重刑的学说。而有关文化